

# 1910年的澳門

安文哲\*

在1910年10月5日，葡萄牙建立共和政權的幾天前，澳門成為了里斯本一本雜誌中絕對不尋常的角色。這本雜誌聚集了一群反對君主制的精英，他們對當時被憲法所禁止的秘密社團共濟會和燒炭黨表示了同情。這些秘密社團隨著背井離鄉的葡萄牙人而來到澳門，它們在澳門<sup>1</sup>的存在十分不顯眼，特別是共濟會。

雜誌《民族魂》在1910年2月10日創刊（最後一期，第34期，在1910年9月29日出版），它是由何塞·安東尼奧·德·阿爾梅達<sup>2</sup>所創立，他是一位熱帶疾病醫生和君主立憲制議會的議員。《民族魂》每週四出版，其經銷地覆蓋各個殖民地、西班牙和巴西，當時還準備出版“兩個特刊，一個英語，另外一個法語”，它的定期撰稿人有克拉戎克羅、巴西利奧·特萊斯、特奧菲盧塔·布拉加、米格爾·彭巴爾達、列昂·阿澤多、安東尼奧·阿奧雷里奧·達·科斯塔·費雷拉、托馬斯·達·豐塞卡、羅勞爾·普羅恩薩和阿基利諾·里貝羅。當時他們正流亡巴黎或被控弑君罪。

《民族魂》的綱領是甚麼？安東尼奧·何塞·德·阿爾梅達<sup>3</sup>給出了答案：“首先，《民族魂》是一份充滿人情味的報紙。它具有革命導向，但革命並不意味著殺戮和破壞。人的生命是一種神聖的東西，只有在跟我們不幸所處的落後的殊死戰鬥中，我們才可以獻出。褫奪一個馴服和被征服的受害者生命是犯罪或幻覺。革命是我們這個落後時

---

\*教員與研究員。著有數部澳門歷史著作。

1. 阿納爾多·貢薩爾維斯：“第一共和國，澳門與共濟會”，《文化雜誌》，第36期，2010年，第55-64頁。
2. 安東尼奧·何塞·德·阿爾梅達（1866-1929）編輯了其他期刊，如《迅雷》（1894年）和《共和國》（1911-1927）。擔任過數種政治職務，曾出任共和國總統（1919-1923）。在他出版的書籍中，有遺作《四十年之文學及政治生涯》，4卷，1933-1934年。
3. 《民族魂》，第1期，1910年2月10日，第2頁。

代令人痛心的需要。只有視為一種仁慈，才是可尊敬的”，未忘記“葡萄牙是一個病入膏肓的有機體。保持現狀意味著結束其生命，給它換換空氣是拯救它。需要清理環境，移除君主制的垃圾或教會的污穢。這一切都在醞釀中。”

在這個風起雲湧的共和前夕的葡萄牙，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葡萄牙根本無暇顧及澳門。因此，東方的異國情調和神秘為媒體所利用。媒體認為，這些是讀者所喜歡的東西。

不應忘記的是，在1910年8月，亞瑟·洛博·德·阿維拉<sup>4</sup>在插圖月刊《晚會》<sup>5</sup>上發表了一篇專敘澳門的長文章。除了透露一些內幕信息外，還傳達了對中國政治的不信任：“今天，儘管中國囂張地說要付諸戰爭，中國人用來逐步消滅我們的殖民地的辦法正是與繁榮背道而馳：煽動中國人口外流。”“富裕商人的外流，貿易的滅絕，堅信隨著競爭對手的蓬勃發展，澳門將毀於掏空，直到甚麼忙也幫不上，然後很容易將我們從那裡驅逐出去。可以想像這番話對殖民和海外政策的轉移十分關注的輿論情緒的影響。正是通過這些細節，可以評估新聞界對公民的文化政治塑造和形成所產生的影響力。

不時傳來只言片語的消息，說明了政府面對的殘酷現實。其戰略構想，在柏林會議上已經遭到重創。《民族魂》<sup>6</sup>雜誌站到了《世紀報》一邊，哀嘆“在澳門與中國產生衝突時，送往那裡三艘軍艦殘敗狀況。”“瓦斯科·達·伽馬號”只是一種擺設，因為它航行不了，“唐娜阿美莉亞號”只能觀望，因為呆在船塢裡，“祖國號”顯示出了它精湛的航海和作戰條件……船艙狹小且不衛生，以致水手都患上了結核病。”

在6月30日<sup>7</sup>版上，有一則給中國共和黨人很幽默的口信：“中國已經決定要有憲法。有人提醒說，這對品味低下的人來說，無疑是美味佳餚。但是中國將小辮子往上一翹，大聲疾呼要憲法。如果是像我

4. 澳門前總督若澤·瑪麗亞·羅博·德·阿維拉（1874-1876）之子。

5. 《晚會》第62期，1910年8月3日，第139頁。

6. 《民族魂》，第2期，1910年2月17日，第17頁。

7. 《民族魂》，第21期，1910年6月30日，第329頁。

們這樣的憲法，那是給予者拱手送給它的臣民的慷慨禮物，但不一定管用。葡萄牙憲章處處是陷阱，謬誤可圈可點。從鐵桿的君主制捍衛者雷森迪伯爵看，這是專制主義的一個偽裝。中國有辦法將集權保護如新並運行良好。今天，說一個國家是專制統治並不光彩，因此，更一更名，一切都與上帝的和諧吻合了。最好是，中國放放風箏，散散心。不費力氣，更可以幻想自由。”所不知的是，孫中山及其澳門的共和黨人的同志是否已經意識到了此種說法。它甚至與庇山耶和文第士關於新政權曙光的想法吻合。

澳門總督愛德華多·馬克斯上尉於1910年8月將工務局局長安東尼奧·米蘭達·格德斯工程師派往了王國首都里斯本，目的是加快某些澳門結構性問題的政治解決，主要是與澳門內港和外港有關的事物。

安東尼奧·米蘭達·格德斯和安東尼奧·何塞·德·阿爾梅達就讀科英布拉大學時，兩人便結下了友誼。後來他們都在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度過了數年，加深了友誼。當得知他到了里斯本，當上了《民族魂》的社長，“不失時機地在9月15日版<sup>8</sup>上刊登了一個長篇的採訪，因為“如果有願意讓澳門擺脫苟延殘喘的停滯局面的好意的話，沒有人能比他更好給我們雜誌的讀者談談這個輝煌的殖民地不久將來的印象。”

1910年6月25日，安東尼奧·米蘭達·格德斯在澳門軍事俱樂部發表演講<sup>9</sup>，議題是港口工程，提出了解決老問題的創新思維。

在此，看到是一個開明、不流血的君主制。它有些無動於衷地容忍了一位殖民地的高級官員接受如此敵視王室的出版物的採訪，而且還捍衛之前說好的政治協議的觀點，可以看到，給予那些有時政治上過激的問題的是無與倫比的道德上坦率的答案。

於是，在這密密麻麻的七頁上，讀者可以更好地了解折磨澳門的問題。諄諄教誨地提及了永恆的政治因素<sup>10</sup>：“如您所知，華人的輿論激烈地圍繞我們在澳門領地的勘界。”誰在背後推波助瀾？當然

8. 《民族魂》，第32期，1910年9月15日，第497頁。

9. 《澳門的港口工程》，澳門，官印局，1911年，第56頁。其後他的演講編輯成書《澳門：港口工程與中國政治》，波爾圖，古埃德斯印刷公司，1920年，第58頁。

10. 《民族魂》，第498頁。

是廣州的一個著名社團——自治會，其英語名字是Self Government Society。這足以反映了它的終極目的。它企圖在開明和富有的中山縣人口中，尋求反對我們的障地。”

然而，在澳門和廣州之間修築鐵路的計劃為我們帶來了莫大的夢想，但它很快破滅了，因為澳門港口工程變成了一個政治悖論。但是，如果沒有小橫琴、大橫琴及其對面山所構成的金三角，這一切不過是一種擴張的幻想。在軍事計劃和外交條約的實質內容方面，絕對不可持續。

但工務局局長的到來還有兩個不同但相互補充的任務。第一項任務與澳門港口有關。安東尼奧·何塞·德·阿爾梅達提出了一個中心的問題<sup>11</sup>：“如您所述，多年來對澳門港口做了深入的研究，有葡萄牙工程的領軍人物羅利<sup>12</sup>的參與就是一種保障，然後又不止一次地談到了施工，為何未實施？是歷屆政府的疏忽或無能執行？”答案至少令人驚訝<sup>13</sup>：“這些簡單的工程，在澳門省的預算內有可用的資金，剛開始，就停下。今天是一個原因，明天又是另一個，歸根到底只是因為……將由國家進行直接管理。”安東尼奧·何塞·德·阿爾梅達詢問<sup>14</sup>到，“在東方有否這些工程的承包商？”安東尼奧·米蘭達·格德斯趕忙回答說：“有的，東方的工作繁忙。眾所周知，那裡如今是世界各國經濟角力的巨大障地，他們競先和建立能力。在那裡為這場宏大的政治鬥爭準備適當的工具。海港和貿易港是這場經濟戰中最佳的固定因素。日本的港口除外，所有的港口都是根據最嚴格的規則裝備的。此種新的努力的廣度和力度使我驚訝——青島（德國）、上海（國際租界或中國領土，如何理解都可以）、香港（英國）、西貢（法國）、馬尼拉（美國）等等在不斷地施工，花費達數百萬美元，並使用功能強大的機器。”如前所見，當地的利益十分重要，要麼是中國控制葡萄牙，要麼是葡萄牙控制中國。稍後，白郎毅工程師將提出疏浚系統，其資金只可能通過賭博和鴉片專營獲得。

11. 《民族魂》，第499頁。

12. 羅利（1836-1911），工程兵將軍，1883-1884年間在澳門，研究了港口工程的技術解決方案。澳門地名中，有以其名字命名的街道。

13. 《民族魂》，第499頁。

14. 同上，第500頁。

第二項任務明顯是政治經濟。從安東尼奧·何塞·德·阿爾梅達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中可以找到端倪<sup>15</sup>：“難道我們不可以取消這些不乾淨的收入來源，並利用港口的商業活動來作為澳門金融體系的乾淨基礎嗎？”工務局局長的回答，從道義上來講，是雄辯的<sup>16</sup>：“必須調正金融。如果是將其基於對惡習的開發之上，必須將其建築在商業和工業繁榮之上。道德的評判的確是斷然的<sup>17</sup>：“惡習使擁有它的人墮入罪惡，蒙上恥辱。甚至那些放縱它的人，更不用說那些謀取私利的人了。”但實用主義卻告誡要相當謹慎，因為與它的決裂會危及澳門本身<sup>18</sup>：“在可能的情況下，立即取消澳門的現行生活制度也許意味著其商業和工業的立即取消和絕對的癱瘓——它們之間關係悠久，此種巨變前所未聞，從人類的角度來看，唯獨有爾，無論道德還是物質上都是難以行通的——毫無疑問，是渴望進行的社會和經濟轉型基本改善難以逾越的障礙。還會發生什麼事情呢？”<sup>19</sup>“我對你談到的體制屬於過渡性質。我們用它正是為了結束它。在新的專營屆滿後，會萌生新的收入來源、新生活、新澳門——不再是摩納哥或東方羅馬——而是一個活動和工作的中心。無愧於使它高尚的傳統，無愧於贊助它的國家。這就像一場革命。一種，你這位朋友所建議和捍衛的邪惡。按照你那充滿信仰和信念的看法，我們的國家，一個新葡萄牙祖國的繁榮基於其之上。”

這個計劃在澳門醞釀了一場真正的革命，其經濟及社會——政治後果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主權。我們都深知這個一維思維的美麗烏托邦的命運。

9月29日，《民族魂》雜誌出版了最後一期。1910年10月5日，共和國革命爆發。何塞·安東尼奧·德·阿爾梅達出任內政部長。安東尼·米蘭達·格德斯差一點被任命為澳門總督。

---

15. 同上，第501頁。

16. 同上，第502頁。

17. 同上，第502頁。

18. 同上，第502頁。

19. 同上，第502頁。

但是最終被任命為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總督，後來因其在澳門公共工程進行的技術工作受到嘉獎。<sup>20</sup>

另一份有影響力的雜誌是《西方》。<sup>21</sup>它報導了葡萄牙殖民帝國對新共和政權的接受，自然包括澳門：“據迄今為止收到的電報，得知新政權宣布的消息在所有的海外領地得到了民眾的熱情歡迎。民眾高興地載歌載舞慶祝共和國旗幟在所有的總督府和官方機構升起。“許久以來，所有的葡萄牙殖民地怨聲載道。不斷地提出各種要求，幾乎都是針對宗主國政府的，不滿各種濫用權利，因循守舊，缺乏物質改進和振興工業和商業的措施。洛倫索·馬克斯、莫桑比克、羅安達、莫薩梅德斯、本格拉、聖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東帝汶、澳門、幾內亞及印度等紛紛發來了電報，表示支持共和，公開表示非常滿意。”

因此，澳門工務局局長在他的關於澳門的工業和貿易發展的技術構思的政治及道德陳述中，熱情溢於言表。這一切的背後是一種新的政治制度的曙光。

在澳門，澳門總督愛德華多·馬爾克斯上尉於10月12日，在會議事公局的涼台上，面對眾人宣布了共和政權的成立。在人群中，可以看到庇山耶、文第士、馬楂多、安東尼奧·杜·納西門托·雷登和何塞·費爾南多·羅德里格斯。有趣的是，升起了“紅綠相間，有紅穗的新國旗”。在這歷史性儀式的記錄上，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但這是怎樣的一種臨時國旗？或許是一些共濟會共和黨人所擁有的國旗草案。直至10月29日，一個由若昂·查加斯、若澤·帕拉、拉迪斯勞斯·佩雷拉、科倫巴諾·博爾達羅·皮涅羅和阿伯爾·博特略組成的委員會提交了一份選擇新國旗的報告。

總督愛德華多·馬爾克斯於1910年11月離任後，由若昂·馬克斯·維達爾和馬楂多臨時代理，政府的動盪又開始了。

---

20. “嘉獎工務局局長安東尼奧·平托·德·米蘭達·格德斯工程師”，民政廳，第271號卷宗，1913年12月3日。

21. 第1144-1145期，XXXIII卷，1910年10月20日，第240頁。

不到一年後，在議會的一次激烈的辯論中<sup>22</sup>，葡萄牙外交部長貝爾納爾迪諾·馬查多就君主制最後一屆政府遺留下來的政治遺產問題，總結了澳門的情況：“至於亞洲，政府見到澳門未勘界。就在昨天，我還不得不回答了一份致柏林的電報，對葡萄牙將把澳門讓步給德國，亦換取更快地承認共和國的說法做了闢謠。可以看到，詆毀活動還在繼續。這只能為人們所完全唾棄。共和黨政府首先遇到是澳門未與中國勘定任何界址，因此所採取的措施之一便是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來勘界。該委員會已完成其工作，很快將完成報告。中國公使已經在里斯本，準備同政府處理劃界。主席先生，我不想隱瞞甚麼，因此我可以告訴閣下和制憲大會最近發生的一件事：已經下令在中國不認為屬於我們的地方開展疏浚。然而，此事並不重要，因為即便承認那個區域不屬於我們的領土，但的確確的是，我們在那裡花得錢算是丟了。僅此而已。”

里斯本的葡萄牙媒體關於澳門的信息並不總是正確與公允的，因為它受制於強大的利益集團和文化與宗教偏見。因此，它的提供信息，在各個層面是有空白和不足的，包括對政治權力的涉及。

貝爾納爾迪諾·馬查多的這番話說明了一個現實的原則，即眾人都深知避免、省略、掩蓋或刪除有關信息為妙。澳門在1910年的形象和地位不完全符合里斯本的媒體所顯示出來的痛楚。直到1926年5月28日民主共和國的結束，這種衝突將是不可避免的。

---

22. 《會議記錄》，第42次會議，1911年8月9日，第9頁。

